

龙门石窟导游



龙门石窟导游

李献奇 李文生 罗建都 编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1249

中国旅游出版社

971249

责任编辑：范云兴

封面设计：穆多杰

装 帧：江 皓

龙 门 石 窟 导 游

李献奇 李文生 罗建都 编著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6号)

北京小武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 $\frac{5}{8}$ 插图：1 字数：35千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统一书号：12179·303 定价：0.32元

前 言

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二十五华里的龙门口。它和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龙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流经其间。春秋战国时称“阙塞”或“伊阙”。公元前 239 年，秦将白起在这里消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见《史记·秦本纪》）。东汉时，才有“龙门”之称。傅毅《反都赋》云：“因龙门以畅化，开伊阙以达聪”。

“龙门”这个名称被广泛采用，始于隋朝。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即位后，认为都居长安不易控制全国局势，决意在“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隋书·炀帝纪》）的洛阳建都。于是，他从长安出发，率千乘万骑，浩浩荡荡，亲临洛阳，登上邙山观察地形，选择建都位置。他南望伊阙说道：“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大臣苏威奉承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从此以后，“龙门”的名字便广泛流传开来。

目 录

龙门山水之胜	(1)
龙门石窟概况	(4)
龙门石窟导游	(13)
禹王池	(13)
潜溪寺	(14)
宾阳洞	(15)
敬善寺和摩崖三佛龕	(23)
万佛洞	(25)
莲花洞和普泰洞	(26)
奉先寺	(28)
药方洞	(30)
古阳洞	(32)
火烧洞	(34)
石窟寺	(35)
路洞	(36)
净土堂	(37)
龙华寺	(37)
极南洞	(38)
琵琶峰·白居易墓	(39)
香山寺	(40)
看经寺	(41)
擂鼓台	(42)
万佛沟	(44)



一、龙门山水之胜

龙门本是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的所在。自北魏王朝在此开窟造像之后，更是风光明媚，气象万千，成为闻名中外、独具风格的形胜之地。这里青山对峙，似耸天彩屏；伊水清澈，宛如一条长龙穿门而过。两山佛龕星列，特别是西山佛龕象蜂巢一样密布在悬崖峭壁上。北魏迄至唐宋时代，两山佛寺林立，亭台楼阁巍峨壮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十寺。流传至今的十寺俚歌说：“十寺八庵首乾元（寺），水绕河边是奉先（寺）；香山寺前见水塘，天竺（寺）云竹八角泉，石窟（寺）是座钓鱼台，敬善寺前珍珠泉，潜溪寺内真泉流，看经（寺）陆州访大贤（罗汉），宝应（寺）落在深山里，足踏广华（寺）望嵩山。”十寺之外，还有点缀龙门山色风光的驿楼、观澜亭、禹王池瀑布等胜迹，都是诗人们笔下吟咏的题材。试看古代诗人笔下的龙门山色风光：

“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

都门遥相望①，佳气生朝夕。”

“精舍绕层阿②，千龕邻峭壁③”

摘自唐·韦应物《龙门游眺》

“东岸菊丛西岸柳，柳荫烟合菊花开。

一条秋水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舫回。”

摘自唐·白居易《题龙门堰西涧》

“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④，

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⑤。”

摘自唐·杜甫《龙门》

“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清光碧玉秋。”

摘自唐·刘禹锡《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

“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

望极九霄迥，赏游万壑通。”

摘自唐·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

“劈开层峦一水来，俨然双阙向城开。

千龕佛像唐雕凿，万世神功禹削裁。

南卷窗帘含远翠，东分岳黛入深怀⑥。”

明·吕维祺《龙门山色》

唐宋以来寓居或游历洛阳的文人墨客，都要畅游龙门，题咏赋诗，借景抒怀。千百年来，龙门就是洛阳的第一胜景。“龙门山色”曾被誉为洛阳八大景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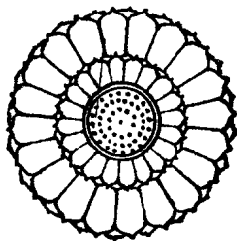
如今的龙门山水，被装点得更富有诗情画意。山上松柏青翠，郁郁葱葱，红楼分布其间；伊水两岸绿树成行，柳荫交夹；山崖下无数清泉从石罅中进出，千态万状；禹王池瀑布飞流倾泻，蔚为奇观。洞窟佛龕及佛像都经过加固保护，登游的台阶也加筑了扶手栏杆。新建的石拱桥横卧两山之间，好似长虹卧波，更为山色增辉。一九六一年，龙门石窟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一九六一年参观龙门，曾挥笔写道：

满山松影今图画，夹道泉声故管弦。

伊水南来康节里⑦，香山西峙乐天阡。

锦绣的龙门山色风光和瑰丽的龙门石窟艺术，不仅吸引着我国各族人民登临游览，而且招徕国外游客观光，成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之一。





二、龙门石窟概况

石窟艺术，源远流长。早在两万多年前，原始社会的人们就已利用天然洞窟描绘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石窟寺，作为佛徒僧侣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相传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的一位王子，比孔子约大十二岁。他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又对当时奉行种姓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不满，就出家独行苦修、静坐思维，终于“觉悟”了人生苦难的缘由和个人解脱苦难的道路。他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广收弟子，传播他的见解，形成佛教的原始教义。他的追随者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和佛陀（简称“佛”，意为“觉者”、“知者”），后来又逐渐神化了。公元前二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到隋、唐达到鼎盛。

佛教传播教义，不仅有庞杂的典籍经论，还有它独特的

表现手段——神秘庄严的寺庙、佛塔和各种法器，以及用绘画、铸金、木雕、泥塑等艺术形式刻画佛与天神的形象和传说故事。由于山林寂静，石窟冬暖夏凉，宜于作为修行场所；依山凿窟又较用砖筑寺便利而耐久，所以在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造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我国古代的艺术家们，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凭借他们精湛的艺术技巧，在遍及十六个省区的陡峭岩壁上，斧凿出数百处石窟寺群，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就是其中灿烂辉煌的瑰宝之一。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龙门石窟的开凿营建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但是，从古阳洞现存造像题记的实际情况看，龙门石窟造像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已经开始。

历史上的北魏王朝，是承继“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一个朝代。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地主割据称雄，战争频繁，城市被破坏，生产衰落，民不聊生。北魏王朝统治者拓跋氏，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在当时各部族长期割据混战中，势力逐渐壮大，于公元439年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

鲜卑族统治集团奴役中原，面临着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比起当时流传的儒学名教和玄学观念更具欺骗作用，佛教便成了他们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精神支柱和统治工具。他们利用佛教，假创符谶，以证明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是出于天命神授。他们长期互相攻

战，屠杀和掠夺广大人民，作恶多端，却希冀通过礼佛、诵经、布施和做功德来解除恶因恶业，并给死者“超生”。另外，他们生前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还追求死后的“冥福”和来世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了狂热的佛教信奉者，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营建石窟寺。

公元398年，魏王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旋改号称帝。在逐步统一和稳定北部中国的同时，佛教也由燕（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赵（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一带传到平城。拓跋珪的继位者明元帝拓跋嗣，使“京邑四方，建立（神佛）图像，乃令沙门（即佛教徒）敷导民俗”（《魏书·释老志》）。原来，按照佛教教义，只有释迦牟尼才是天上人间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佛徒只对释迦牟尼顶礼膜拜，皇帝也是佛的弟子，佛徒不向皇帝行跪拜礼。而当时的僧人法果，却明白宣称，帝王就是“当今如来”，拜天子就是礼敬如来，和尚也应该对皇帝跪拜。世俗的统治者操纵佛教，佛教的信徒为帝王效劳。这不能不说是佛教本来教义的篡改。

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凉，迁徙沮渠氏的宗族十万户于平城，其中有不少名僧和佛徒。因此，“沙门佛寺，皆俱东，像教⑧弥增矣”（《魏书·释老志》）。到文成帝拓跋濬时，更下诏强调要利用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并专门设立了统管佛教事务的中央官职“道人统”，后改名“沙门统”，由皇帝任命僧徒担任。当时的佛徒曾按拓跋濬的身材面貌制作了石佛像，据说石像的脸上和身上都有黑斑，同拓跋濬身上的黑痣一样。这就是史书所载的“诏有司为石

像，令如帝身。”兴光元年（公元454年），拓跋濬又下令在京师平城五级大寺，为北魏开国以来的四个皇帝和他自己各铸一丈六尺高的铜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拓跋濬批准由沙门统昙曜在京城西郊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五个北魏帝王，各开凿一个石窟寺。这就是大同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

北魏鲜卑贵族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必须摆脱鲜卑贵族内部守旧势力的影响，接受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族中原文化，以缓和辖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增强实力，与南朝汉族统治政权相抗衡。到了魏孝文帝元宏（因实行汉化政策，改鲜卑的“拓跋”姓为汉姓“元”）时，他深感帝都平城偏居北边，土地贫瘠，又无水陆漕运，粮食常常短缺，在军事上也受到北面柔然族的威胁，很不安全，便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5年）率二十万大军，“亲御六旌，南伐萧逆（指南方的萧齐王朝）”。到洛阳后，宣布定都洛阳。自此，大规模开凿石窟寺的工程中心也转移到新都洛阳。当时支持元宏推行汉化政策和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及高级将领，诸如北海王元祥（元宏的弟弟）、安定王元燮（元宏的亲信）、广川王妃侯氏（拓跋濬的从叔母）、齐郡王元祐（元宏的堂兄弟）、司空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以及辅国将军杨大眼等，都在龙门古阳洞开龕造像，使古阳洞成为北魏王公贵族最早发愿造像的第一大窟。元宏死后，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继位，佛寺、佛塔的建造和佛像的雕造更兴起了一个高潮。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正光年（公元520—524年）以后，北魏全境有僧尼二百万人之多，佛寺三万余所，仅洛阳城内外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此时，北魏统治者在龙

门营建了宾阳洞，其规模之大，用工之多，富丽堂皇之状，在当时更是无与伦比。从此，龙门石窟作为一个艺术宝库，已经颇具规模了。

然而，大规模的礼佛造寺活动，给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也不可能“福佑”北魏统治者们的帝业长存。龙门石窟第一次历时四十余年营造高潮，随着北魏王朝的分裂和衰亡而结束。其后，继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诸朝相继开凿，使大大小小的窟龕，密布在伊水两岸崖壁上，绵延长达一公里之多。其中第二次营造高潮是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和玄宗四帝在位期间（公元627—756年），计一百一十多年。据统计，龙门石窟唐代造像占总数一半以上。

据解放后龙门文物保管所统计，两山现存窟龕二千一百多个，大小造像十万余尊，佛塔四十余座，造像题记碑文约三千六百多块。其中最大的造像高达十七点二四米，最小的仅二厘米。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大型洞窟二十九个；伊水东岸崖壁上全是唐代窟龕，其中有七个大型洞窟。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普泰洞、魏字洞和石窟寺等；东魏时期窟龕具有代表性的有路洞和一些小龕；北齐时期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要算药方洞和一些小龕造像；隋代作品的代表是宾阳南洞北壁的梁佩仁造像龕等；唐代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有潜溪寺、宾阳北洞、敬善寺、万佛洞、惠简洞、赵客师洞、奉先寺、龙华寺、极南洞以及东山的看经寺、擂鼓台诸洞。

龙门石窟造像，是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历史

见证，同时又是历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家无穷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建造龙门石窟的雕刻匠师，承担着为神佛和帝王造像的使命，却突破了宗教和礼教的“仪轨”束缚，在雕刻作品中融进了大量现实生活。各种人物造像的动人表情，如喜悦、慈祥、威猛、矜持，以至作为至高主宰的佛的庄严肃穆，胁侍人和供养人的虔诚宁静，无一不是艺术家们对现实的“人”的深刻观察，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加以高度概括集中的结果。而构思布局的完整，气势的贯注，整体的坚实有力，性格的多样，衣纹线条的流畅优美等等，更是在千百年艺术实践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外来技法、风格，精心创造，刻意经营的结果。富有才华的古代雕刻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面对着悬崖峭壁，运用简单的锤凿，雕出如此巍峨壮观又精致入微的群像，这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确实令人叹为鬼斧神工！

龙门石窟为研究北魏到唐、宋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民俗及雕刻、绘画、建筑、服制、乐舞、书法、医药以及中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它无愧是一所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通过考察龙门石窟为数众多的北魏和唐代造像，可以明显看到当时绘画、雕刻艺术的承袭演变过程和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冈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面容造型都是脸型略长，眼若纤月，眉如半弧，鼻翼丰满，嘴角略向上翘，呈微笑状。在服式上，以前造像的偏袒右臂及通肩服式，都是薄衣贴体；北魏作品

变化成长裙、宽袖、垂摆，即汉化了“褒（宽）衣博（宽）带”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推行的汉化改制情景。在躯体造型和衣纹雕法上，北魏造像的特征是胸部平直，体态平稳，衣纹用平刀法雕，坚劲质朴。而唐代的造像，肌肉丰腴，胸部隆起，身躯健美，体态匀称；面部造型颐丰颊满，慈祥温和，使人感觉可敬、可亲；衣纹用圆刀法雕，圆润流畅，生动真实。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贯注了汉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柔和自然的写实作风，成为完全汉族的世俗艺术。

在装饰艺术上，也各具鲜明的时代特点。北魏宾阳中洞的背光、藻井、地面和洞口拱额图案，莲花洞、古阳洞的拱额、帷幕及串珠、璎珞，唐代奉先寺卢舍那佛像的背光及万佛洞的藻井，北魏、隋、唐菩萨像的宝冠、项链、璎珞和臂钏，婀娜多姿的飞天，熊熊生动的火焰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不同时期艺术家的卓越艺术创造才能。

在古代服制方面，龙门石窟有北魏帝王、皇后、嫔妃的服饰，有唐代流行的服装以及各种装饰，还有中古时期的武士甲冑等。这些都是研究当时服制的重要例证。

我国古代不少乐器已经失传，但从龙门石窟的造像中，还可以见得其形象，如箜篌、箏、法螺、羯鼓、鸡娄鼓等。

药方洞中的药方，据统计有一百四十种，现存文字完整的还有六十余方。这些唐代的石刻药方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石刻药方，经有关专家鉴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龙门石窟中，还有丰富多样的古代建筑历史资料。许多龛额的结构变化各有千秋，诸如尖拱、楣拱、盪拱、屋檐拱

等。一千多年前的营造法式，如歇山式、庑殿式、四阿式等建筑结构，在这里也可以找到范本。

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驰誉中外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收集研究家从龙门石窟为数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挑选出来的精品，堪称是北魏书法艺术的精萃代表，所以魏碑体又有龙门体之名。据统计，龙门石刻碑碣题记多达三千六百余块。所以，“龙门不仅为石佛场，亦古碑林也”（清·武亿：《伊阙诸造像记》）。这些铭记，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研究龙门石窟造像分期对比提供了时间断代的根据，有的还可证史和补史之缺。这些造像铭记基本上是魏碑体和唐楷，是研究我国古代书体变迁史的珍贵资料。碑刻中还间有后代书法家如清代乾、嘉时刘墉等人的楷、行、草书真迹，可供书法爱好者鉴赏。

龙门石窟作为古代佛教的胜地之一，留下了不少邻邦友好使者的足迹，是我国与各友好邻邦友好往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龙门西山观澜亭（珍珠泉附近）南，半山腰有古新罗（在今朝鲜）僧徒造像龕，龕楣刻着“新罗像龕”四个字。中国和朝鲜两国当时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已十分频繁。朝鲜的佛教、佛经就是由中国传去的。现存的朝鲜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与我国唐代的石刻造像就十分相近。

吐火罗即今阿富汗，在乌浒河（今阿姆河）以南，是“丝绸之路”南路的经由之地，故自我国唐朝时即与我国关系密切，交往甚为频繁。在龙门东山看经寺上方山腰处，有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九月一日，吐火罗僧宝隆造释迦牟尼像一铺（龕）的题记。

印度古称“身毒”、“天竺”，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传教的故乡。出生在印度的僧人善无畏（公元637—735年）和金刚智（公元669—741年）二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先后来到中国，翻译传播密宗经文，曾在洛阳各大寺院讲经。因为他们仰慕龙门山水，善无畏死后葬于龙门西山北广华寺，金刚智死后葬于龙门西山南岗。他俩和不空被称为唐代“开元三大士”。唐人苏颋撰《河南龙门天竺寺碑》还说：北印度迦湿密罗国人宝思惟捐资在龙门建造天竺寺。原碑已出土，现存龙门文物保管所。

另据史载，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十二月，日本僧人智证圆真大师到龙门广华寺礼拜善无畏舍利塔；翌年，又回到龙门西岗（今龙门南魏湾村北山岗）寻访金刚智阿闍梨（意即“轨范师”，佛教弟子对师父的敬称）坟塔。这就更是亚洲各国人民情深谊长的一段历史佳话了。